

## 新發現石璋如未刊書稿

曹菁菁

**內容提要：**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有石璋如先生著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未刊手稿《古墓發現與發掘》。本文考述了此書的成書緣由和入藏情況，並著重發掘此書在中國考古事業創始階段的學術史價值。

**關鍵詞：**石璋如 手稿 中研院史語所發掘史 先秦遺址考古

石璋如，河南偃師人，著名的考古學家、甲骨文專家，是中國考古學家的第一代。1931 年，石璋如以河南大學史學系學生身分，參與中研院史語所“安陽發掘團”在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工作，從此與考古結下不解之緣。1932 年從河南大學文學院畢業後，他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研習考古專業，參與了中研院史語所的多次考古活動。1945 年隨史語所遷台，相繼擔任大學教授及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並成為臺灣史前考古的奠基人之一。

衆所周知，在大陸地區考古方面，石璋如對安陽發掘和西北考古有着重要的學術貢獻，著有《殷墟建築遺存》（1959）、《小屯：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一）－（五）》（1970－1980）、《小屯：甲骨坑層（一）》（1985）、《小屯：甲骨坑層（二）》（1992）《侯家莊（第十本）》（2001）以及《莫高窟形》（1996）。

然而不爲人所知的是，石先生曾經在上世紀 40 年代初寫過一本總結 1937 年日本侵華以前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工作及中國大陸地區重大考古發現的書——《古墓發現與發掘》。這本書僅有手稿，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金石組。

該文稿之上，紅色修訂之迹與黑色批注之迹宛然，正文手迹、批注手迹和繪圖上的字迹完全一致，基本可以斷定是石先生的手稿。這份手稿簡單地以綫裝形式加以裝訂，封皮題有“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第六種”的字樣。

### 成書緣由

石璋如先生在此書的自序中寫道：

至七七抗戰軍興，隨所西移，既不能繼續發掘，只有從事室內之整理。希望乘

此時日，將歷年新得之考古趣聞作一清結。由二十八年（1939）春季開始至三十年（1941）春季竣事。歷時凡二載，所址又兩徙，其間時輟時作，草率自知難免，然不過作備忘之錄，本無問世之意。茲者承董彥堂先生介紹于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編，復承陳夢家先生之權，終承袁守和先生之不棄，附刊于編末。謹志此以謝。

三十年八月十五日石璋如自序于西川板栗寓舍

顯然，此書是在中研院史語所因日本侵華戰爭而西遷流離的過程中寫就的。日本侵華戰爭以後，史語所諸位考古學家為戰事所迫，全部向西南撤離，讀書科研已屬不易，考古發掘更是無從談起。許多考古學者開始在書齋中埋首於早先考古材料的梳理和研究。1940年日軍進攻緬、中、印邊境，昆明局勢趨緊，西南聯大及史語所等學術機構又遷往四川。故1941年前後，史語所在四川的李莊落腳，租用當地官紳的一處莊園為居址，地名板栗坳。石璋如先生正住在那裏，所以序中稱“西川板栗寓舍”。當時，袁同禮先生率國立北平圖書館部分館員也前往川滇以避戰火。袁先生的兄長袁復禮是“中國人中參加史前考古發掘第一人”，自己又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委員，不但對於中國的考古事業多有關注，而且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諸位學者相熟。避戰西南之時，袁先生一直竭盡全力為聯大及科研機構提供書籍以便其繼續研究；同時，還策劃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考古學叢刊”，旨在收集並出版中國考古學家在戰時的研究成果。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組所藏石璋如先生的書稿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收入北平圖書館的。由於戰亂漂泊、力不能逮，這套“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一直未能付梓，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石璋如先生自參與史語所在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之後，便一直參與史語所的多項工作，長期從事田野考古。避戰期間，石先生整理了戰前史語所歷次發掘及實地調查的資料，以及當時幾次著名考古發現的相關材料，並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撰寫了本書，旨在初步總結戰前歷次考古發掘及田野考察的相關情況。由於本書着眼於先秦遺址的歷次考古發掘及考古發現，此書原題為“中國已發現的銅器時代的葬地”，後來又斟酌改為“古墓發現與發掘”。所謂“發現”是指大規模的文物發現，但是文物出土的過程並非正式科學的考古發掘過程，往往是由盜墓者發現或當地人意外發現的；所謂“發掘”則指由中央研究院等考古機構主持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此書希望通過多方面的記錄，展現這些古墓遺址所經歷的盜掘、考古調查和考古發掘過程，突出其文物出土的地點及現場情況。

## 內容框架

石先生在前言中敘述了自己寫書的動機。他認為中國傳統考古之學重器物、重銘文，却往往忽視出土信息。除了宋代學者曾經對古物的出土地做過簡要記錄外，後世的學者都不重視出土地點。然而，現代考古學區別於傳統金石學的一個特點便是注意發掘古物本身之外的信息。石先生儘可能地描述了百年之內各考古發現的具體位置，並親手

繪製了“銅器時代葬地分布圖”，以資日後考古調查之用。

正文則記載了史語所或其他單位在 1937 年之前所進行的主要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以及當時的重大考古發現，共 12 處重要遺址。目次如下：

陝西寶雞鬥雞臺

河南洛陽金墉鎮（按：即洛陽金村）

河南新鄭李家花園

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

山東滕縣安上村

山東益都蘇埠屯

山西渾源李峪

河南安陽洹水兩岸

河南浚縣辛村

河南汲縣山彪鎮

河南輝縣琉璃閣

湖南長沙近郊

對於每個遺址，石璋如先生基本上分如下幾個方面介紹遺址情況：“史地的背景”、“神話的傳說”、“墓地的範圍”、“關於盜掘”、“科學的發掘”、“墓葬的種類”、“遺物的種類”以及“參考書”。各部分內容大致如下：

“史地的背景”：主要以傳世文獻為資源庫，蒐集遺址地區的地理沿革與歷史背景。

“神話的傳說”：這部分內容除了從傳世文獻中蒐羅與該區域相關的神話傳說、歷史軼聞外，還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民間傳說。這些民間的傳說和故事都是史語所考古隊員們在實地考察或發掘時從當地居民那裏蒐集來的。傳聞大都與古物的出土和流散有關，可以為後續研究提供輔證。

“墓地的範圍”：本部分詳細描繪墓地四週地域的四至情況以及墓地區域的地貌特徵，石先生還親自為其中的大部分墓葬點描繪（或摹繪）了墓地區域圖。

“關於盜掘”：石先生在文中表白道，盜掘信息“為正式報告所不錄，故不厭求詳”。在中研院開始科學考古發掘之前，古墓的發現，不論無意或蓄意，最終都會以買賣古物為最終驅動力。既然以盈利為目的，自然不會關注文物的出土信息和學術價值。為填補這一信息源的空白，石先生在這一部分對各墓葬區盜掘情況進行了總結，所載盜掘活動時間上限大致在 1830 年。這部分不但描述了盜掘者在墓葬點留下的痕迹，還詳細記載了之前百年間的歷次重大文物發現，歷數文物的類別和數量，並儘量記錄這些文物的收藏情況和流散方向。這對於梳理海外流散文物來說是很有價值的資料綫索。

“科學的發掘”：根據當時史語所所有的各種考古簡報及相關記錄整理而成。主要是以大綱的形式記錄了當時各先秦遺址的發掘過程。

“墓葬的種類”：這部分主要是對考古發掘及調查工作的各種數據和資料進行梳理和研究，針對遺址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對墓葬的葬式及結構特點進行了總結和分類。

“遺物的種類”：由於本書所記載的這些墓葬點均為先秦時期的墓葬，遺物也以青銅器為主。石璋如先生對各地可考的出土青銅器類別進行了描述。與今天的器類劃分及

命名相比，當時學者對於青銅器的分類命名或許並不系統也不規範，但却是瞭解當時器類研究的直接材料，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參考書”：主要蒐羅了當時可見的考古簡報及相關資料，時人的相關研究著作及青銅器圖錄。這些著作不但有國人的，還有西文和日文文獻。每一個發掘單元後都有這樣一個參考書目，可算是研究這些考古發現的專題書目。

本書後還有附錄《地點不甚確定的葬地》，其中列出了自 1900 年以來所聽聞的遺址發現地，全部按地域排列，具體情況如下：

陝西：鳳翔岐湯里；岐山清華鎮、周家橋；扶風法門寺；郿縣禮屯；淳化魏村、西安斗門鎮張村、藍田驪山白鹿原、王山鄉；乾縣甘谷、好時村

河南：孟津縣莊村、侯家莊、朱家溝、扣馬；偃師大屯；鞏縣回廊鎮；禹縣；西華；桐柏

山東：鄒縣紀王城；壽縣梁山；臨淄齊故城；壽光紀侯臺；臨朐柳山寨；諸城喬莊、巴山村、石屋山、吳太尉墳；膠縣靈山衛；福山汪家村；博山禿峪村

河北：邯鄲趙王城、涑水張家窪；易縣燕下都

山西：榮河后土祠；吉縣安平村；聞喜南王村；長子王村；代縣蒙王村

最後，是本書的《後語》。《後語》並非是幾句簡單的答謝的話，而是石先生對上述考古發掘和發現所做的一次嘗試性的科學總結。他將這些墓葬的地域時代同其葬制特點聯繫起來，並加以統計分析，力圖發現其中所隱藏的規律，以求解答如下問題：古人在墓葬地的揀擇上是否遵循了某種規律？各時代的葬制是否有一個通用標準？《後語》中，五張圖表最為重要，即：1. 十二墓地時代比較表；2. 十二墓地擇地比較表；3. 十二墓地取勢比較表；4. 十二墓地墓葬方向比較表；5. 十二墓地墓形葬制比較表。

## 學術價值

《古墓發現與發掘》是一部系統總結 1937 年前科學考古工作及盜掘發現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史文獻意義和重要的資料價值。

### 1. 保有大量少見的考古發掘記錄及考古發現的較早記錄

本書最突出的資料價值在於它蒐集了大量如今不易見到的重要資料。中研院史語所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考古活動是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獨立實踐的發軔。1937 年前的短短 10 年間，史語所對幾處商周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收穫頗豐。然而，因為人手時間等問題，相關的發掘報告却公佈得很不及時，多次考古發掘的材料都是以中研院內部考古簡報的形式發佈的，甚至還有不少材料保存在史語所中尚待整理。在石先生寫這本書之前，還沒有出過任何一本專著來集中介紹史語所的歷次重要發掘及當時的考古重要發現。1949 年前後，考古學家們也因各自的選擇而遙望海峽，當年史語所的各種發掘材料也分散兩岸，其中有不少材料或者難覓其踪，或者亡佚無存。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一部專著較好地全面介紹史語所戰前在大陸地區所做的考古工作。

迄今為止，這 12 處遺址的考古記錄，除了陝西寶雞門鵝臺<sup>①</sup>、河南安陽洹水兩

岸<sup>②</sup>、河南浚縣辛村<sup>③</sup>及河南汲縣山彪鎮、琉璃閣<sup>④</sup>已經出版了考古報告之外，其他的遺址有的祇有考古簡報，還有的則祇有散見的材料。

僅有內部考古簡報的有：

a. 山東滕縣安上村

1933 年，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的“山東古迹研究會”對山東滕縣安上村進行了發掘。由董作賓主持發掘。發佈的考古簡報見 1933 年許昌國、馬維新所著《滕縣安上遺址發掘紀要》，山東大學《勵學》第一期。以及 1934 年《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

b. 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

1933 年，朱家集的村民在李三孤堆進行了一次有組織、有步驟的盜掘。共掘出了 800 多件銅器。這一盜掘案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注意。1934 年，中央研究院派李景聃等人前往壽縣、朱家集進行考古調查。本定於 1937 年進行考古發掘，終因“七七事變”而止。發佈的調查報告為李景聃《安徽壽縣楚墓調查報告》，見《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

c. 山東益都蘇埠屯

蘇埠屯位於臨淄附近，時有古物出土。中研院史語所於 1937 年特派祁延霈對蘇埠屯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以便發掘。然發掘工作也因“七七事變”而未能成行。發佈的調查報告為：祁延霈《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田野考古報告》第二期。

僅有考古調查材料，未曾形成考古報告的有：

河南洛陽金墉鎮（按：即洛陽金村）

洛陽金村是當時非常著名的考古發現，出土了大量極具特色的金銀錯青銅器。然而多次的文物發現都是因盜掘而得的。主要盜掘者——在河南的傳教士懷履光（William C. White）就親自帶領民工盜掘了一大批文物。他著有《Tombs of Old Lo-yang》<sup>⑤</sup>（《洛陽故城古墓》）介紹了文物的情況，但是對於出土現場的信息却說得不清楚。1930 年後，中研院史語所對洛陽金村勘察過四次，為進一步發掘此地準備資料。本打算 1937 年秋季開始發掘工作，因“七七事變”被迫中止，而四次考古調查的所有資料均未刊佈。

至於山西渾源李峪、湖南長沙近郊等沒有經過科學考古發掘的遺址，文物出土及墓葬特徵的情況就更難得知。

石先生在本書中梳理了這些遺址所經歷的盜掘史，悉心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及傳聞，對於發掘信息極度匱乏的遺址來說，石先生的記述保留了很多有意義的材料，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同時，石先生還在本書中插入了很多自己及朋友拍攝的照片。如：石先生在安陽小屯發掘現場照的照片；安徽繳獲 712 件壽縣楚器後，將其擺置於一大廳中的照片；安上村與虎山遺址的照片；安上村遺址出土銅器的“合影”；汲縣遺址發掘現場的照片。這些圖片都很罕見，是難得的歷史瞬間。

2. 本書在學術史坐標上的“樣本”價值

本書也生動反映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中國的傳統，是有金石學（或云古物學）；而無現代意義的考古學的。外國探險考古家——如

斯坦因、斯文·赫定、烏居龍、桔瑞超等人——在中國的探險考古活動刺激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然而，這些探險考古家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考古。直到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家開展的多次考古發掘才標誌着中國進入現代考古時代。發軔期的中國考古學，一方面還深深受着傳統金石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它所依賴的理論框架却都是西方的。

從本書對多次考古發掘的記載來看，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理論已經在考古發掘中得到運用。在敘述各個墓葬遺址的時候，明顯可以看出石先生所引用的考古發掘資料在地層分析方面，使用的是文化堆積的自然分佈分層標準，而非水平層標準。當然，那時候的地層劃分遠沒有現在的精細，他們常用的標準是土壤的質地、粒度和成分。而常見的標誌物是燒土顆粒、炭屑、雲母等物。對於文化層打破、擾亂的現象，本書也給予了關注。以新鄭李家花園古墓為例，石先生自繪了發掘坑位圖，該圖顯示其中有兩個後掘井口打破了墓葬的主坑位。類型學是通過對考古遺存的形態排比，以探求其變化規律和邏輯發展序列及相互關係。運用類型學的基礎便是對居址或墓葬進行分期。石先生在本書中指出：這些墓葬遺址雖然都屬於青銅時代，但是各個墓葬坑的時代却不限於一個時期，必須要加以分明。他把青銅時代粗分為殷、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五個時期，並根據墓葬的地層特點和隨葬品內容將遺址的墓葬進行了分期排列。

同時，石先生還在考古學方面進行了新的探索。《後語》中，石先生嘗試對這些墓葬出現的地點進行類比分析，希望可以揭示出青銅時代各文化圈墓地選擇的某種規律。這是對類型學的進一步應用。他的分析主要分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墓葬地點與當時所屬國之都城的地理關係，或者與當時大城的地理關係；第二，墓葬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第三，墓葬的方向；第四，墓葬的形制，包括墓形、填土、人骨放置情況以及殉葬情況。根據這些分析，石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推論。第一，中國人重祖先重祭祀，故而，這些有重器出土的大墓通常在都城附近，至少也要在有規模的聚居地附近。第二，青銅時代的華夏文明圈在選擇墓葬的地勢時，有着通用的標準，即依山傍水的高低。第三，墓葬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理條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地域，如果一個墓葬的方向與其他墓葬的方向明顯不同，那麼它往往是屬於不同分期的。第四，墓葬形制的特點因地域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是墓葬分期分類的重要依據。這些推論如今都是先秦考古學中通行的常識。

60多年來，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各種考古報告和研究著作也層出不窮。但是石璋如先生的這本書仍然有很重要的價值：它保留了大量中研院史語所未刊佈的材料；系統描述了解放前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進行的各項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結果；記錄了當時主要出土文物的盜掘情況和流散經歷；反映了1940年前中國考古理論和實踐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 注釋：

- ① 1933—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徐炳昶主持了對寶雞門雞臺地區的考古發掘。溝東區的周秦墓地是這次發掘的重要收穫。參見蘇秉琦《門雞台溝東區墓葬》，（北平）國立北平大學

出版部，1948 年版，鉛印本。

- ② 1928—1937 年，中研院史語所對安陽洹水兩岸的多個殷商遺址點進行了 15 次發掘。李濟、梁思永等先後主持了發掘。可參見李濟、梁思永、石璋如、董作賓等《小屯：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甲乙丙丁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1992 年；梁思永、高去尋、石璋如《侯家莊：河南安陽侯家莊殷代墓地》（共十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2001 年。
- ③ 1932—1933 年，中央研究院與河南政府共同組織的“河南古跡研究會”對河南浚縣辛村地區進行了四次考古發掘，均由郭寶鈞主持。可參見郭寶鈞《浚縣辛村》，（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
- ④ 1931—1935 年，中研院所轄之“河南古跡研究會”對這兩個墓地共進行了四次考古調查。於 1935 年 8 月開始對兩地進行考古發掘，由郭寶鈞主持，歷時月餘。可參見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科學出版社，1959 年版；河南博物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版。
- ⑤ 譯者按：White, William Charles, *Tombs of old Lo - Yang :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 - tsü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 C.*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34.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組）